



病榻憶往—宗陶老人自述（二）

昌彼得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六、中大四年

中央大學（以下簡稱中大）設有七個學院——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師範、醫、農，在當時是一所完全的大學，校址分在三處，除了醫學院設在成都華西壩外，其餘六院都在重慶沙坪壩，但所有一年級的新生上課都在江北縣的柏溪。柏溪在嘉陵江的中游，有小江輪可通沙坪壩及重慶，也可以走江北縣旱路到沙坪壩，水路約三、四十華里，旱路大概二十來華里，一個多小時可達。柏溪右背兩面有山，前面則是一大片平地，分校蓋在其中，山上流下的溪水，學校修了三面堤防攔截，就成了一個游泳池，校有體育場及各種運動設備。我在恩施熱愛的籃球，進了大學卻全提不起興趣，雖有同學聽說我是恩高的好手，來約我組球隊，我都婉謝了。一年級的課程大都是普通的，如國文、英文、中國通史、西洋通史、近代外交史等等不超過二十個學分，我除了每天清晨到偏僻地方高聲背誦國文或英文，課餘則埋首圖書館參考室，找資料編寫報告或看一點史學名著。柏溪有學校自備的發電機，電燈雖不很亮，也許是電壓不夠，但比起恩施的桐油燈好多了，可在宿舍內看書。學校伙食也不錯，白米飯、四菜一湯可以吃飽，校外沒有民房出售食物，不吃飽，夜間只有挨餓了。我進學校，就有學長及職員警告我，叫我們太陽落山後，就不要到游泳池去游泳。傳說此池有水鬼找替身，每年有淹死的，我聽了並不以為意。第二年的初春，晚飯後我與一位同學到泳池洗腳，坐在池邊兩腳放在水中浸泡，突然感到有一股力量將腳向下拖，我猛

然驚覺，趕緊起立穿鞋，返回宿舍。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去游泳池游水了，寧可多走一些路，下到江邊戲水。

一年級讀完，搬到沙坪壩校本部。沙坪壩又叫沙坪壩，所謂壩子，四川話意指一片高出來的台地，沙坪壩相當遼闊，從歌樂山到嘉陵江，南從小龍坑，北到瓷器口，這一大片土地，統名沙坪壩，是重慶著名的文教區，除了中大外，還有重慶大學、軍事財務學校、科技專校，與著名全國的南開中學。中大僅侷促在松林坡一地，臨嘉陵江隆起如饅頭般的山丘，上面原種滿了松樹。學校利用這個地形，從高處而下，作環形建了好幾環的房屋，再修石級上下串聯溝通，房舍多用木材竹籬建成，有點像五、六十年前臺灣一般的民舍，不同的是臺灣多用榻榻米地板，中大多用木。僅有一座大禮堂用磚瓦建成，學校因為地狹，所以沒有體育場，僅有兩座籃球場，體育活動則借用重慶大學的運動場。卅二年舉行的重慶區二十八所院校聯合運動會，中大選拔選手即借重慶大學場地。運動會正式舉行還在南開中學內，他們的運動場更大、更標準。這次選拔，我報名參加中距離賽跑，400公尺只跑了60秒，竟被選拔代表中大參加1,600公尺接力賽，第一名也只跑出56秒，這樣的爛成績居然得到第一名。一般成績都比我在漢口參加的中學運動會還要差，大概是抗戰時期青年都營養不良吧！我雖居末尾，卻沾光獲得了一面金牌作紀念哩！

從松林坡到江邊是一個舒緩的斜坡，當地居民把它開闢成梯田似的一層層的平地，中間再

【特
載】



修建一條石階串聯，一直延伸到江邊。這些開出來的平地，老百姓利用來開茶館，備置大量的竹躺椅，可供茶客或坐或躺，這是沙坪壩的一景。不僅中大學生，重慶大學的學生也常來，在此地可以無拘束的聊天、看書、下棋、討論學問、打撲克牌等等，累了可以假寐或小睡片刻。我在沙坪壩三年，有一半的時間即消磨在茶館中。

我的初戀發生在念中大時期，卅二年的暑假，我父親因事由萬縣來到了重慶，住在他朋友樂先生的家中。樂先生是一位富商，在南岸有一棟別墅，客房也多，我去看父親，也就留住下來。樂先生有位女兒，名芙蓉，就讀長壽的國立十二中高中，雖是大戶人家女兒，但無嬌氣，美麗大方，談吐也不俗。我住她家時經常晤面，聊得非常高興，好像多年老友般，晚飯後常外出散步，聊些重慶的歷史古蹟，她也聽得非常有興趣。五、六天後，我父親走了，我也回到了學校，但腦際常出現她的情影，好不容易等到開學了，我即寫信傾訴別後的離情，很快的就獲得她的回信，從此書信往返，日漸繁密。重慶到長壽的信件，一次往返，大概需要一個禮拜，後來密到三天寫一封信。爲了怕信件遺失，或所談的事情能銜接，信件需要編號。我每天的一件重要事，就是看信箱。卅三年春，她主辦班上的壁報，來信要我經常寫點文章，供她壁報登載。我就經常寫點關於讀書的方法，做人的道理，以及時事分析等一類的小文章，供她登載，她看稿源不斷，也非常的高興。當年的九月，日軍攻陷貴州的獨山，政府發起十萬青年十萬軍，鼓勵青年學生從軍報國，我們知道政府的真正用意，並不在抗日，因爲日本的敗象早已顯露，覆亡在即，真正的用意是提高軍中的素質，來防範共軍的崛起。一天，同學陳昌裕君跑來告訴我，說芙蓉投筆從戎了。聽後，大吃一驚，最近還收到她的來信，一點沒有透露這種意願，我趕緊連寫了兩封信，請她慎重考慮，並說報國的途徑很多，不一定要從軍，信去後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。我的初戀，就這樣突然中止。一年多的戀情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在我的心中烙下的記憶，久久不能忘懷。

老伴去世後，我偕同女性友人外出。若去到「推仔」的處所，有時會產生幻覺，身邊的她就是芙蓉，真是思念之深，歷數十年而不移，只有時常在心中默祝她平安幸福。她假若在世，現在也是年逾八秩的阿嬤了。所謂「推仔」我賣個關子不說，請讀者來推敲，也許是一個很好的頭腦訓練。

歷史系自卅年沈剛伯老師接任系主任後，多方延聘名師任教，呈一片新象。我入學時，同班同學只有十三、四人，升到二年級時，增到二十四人，有從他系轉系的，也有他校轉來，是沙坪壩時期最盛的時代。老師中有教上古及商周史的丁山（字山甫），教春秋戰國史及國語、左傳專書的顧頡剛教授，有教漢魏六朝史的賀昌群老師，有教明清史的郭廷以老師，教通史及中國文化史的繆鳳林（字贊虞）老師，西洋史方面，沈老師開的課很多，除埃及、希臘、羅馬、兩河流域史外，有英國史、法國大革命史。據學長們談，沈老師最叫座的是西洋通史，上課時不僅教室中擠滿了人，窗戶及門外也站了不少的人，很多是從遠地趕來旁聽的，不過我沒有耳福，入中大時，沈老師已不開西洋通史，而由他的學生來教了。老師中我比較喜歡丁山甫老師，常常到他家請益，特別是我沒錢買煙抽的時候，約二、三同學到他家去，丁老師看見我們來也非常高興，叫他的小孩去買些煙、酒及花生，坐在院子裡聊天。瓷器口的鹽酥花生是四川最有名的，也很便宜，我們一邊抽煙飲酒，一邊聊天，請教我們看書中不甚了解的地方，或有關時局的問題及做人的道理，丁老師很健談，使我們增長了許多知識與見聞。在臺灣，我在大學兼課時，也常對學生說往事，我說學生吃老師，是天經地義，老師吃學生就不應該了。當然抗戰時期，學生多窮，而老師有收入，現在的學生未必窮，不過老師請學生還是應該的，所以學生不要以爲意。賀老師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精通英、日語，文章寫得好，詩也不錯，但拙於言辭，去他家往往無話可說，所以就很少去他家了。賀老師之拙於言辭，我談一點往事。卅二年，他開世說新語一課，世說新語都是記載漢魏間如竹林七賢的軼事，應該是很



有趣的，但賀老師講，我們卻聽得索然乏味，有時他講後咯咯笑個不停，因為他能領會覺得好笑，而我們未能領會，當然不覺得好笑了。賀老師家除了功課上的問題才發問請益，平常就很少去，但我仍然很喜歡他。沈老師是湖北宜昌人，武漢高等師範畢業後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，主修考古學。他所開的雖然都是西洋的歷史，但他對中國經史也非常的精通，講西洋史時，常取同時期的中國史實對照講評，真可以說是學貫中西，博通古今，而且口才又好，他的講演筆記下來，就是一篇不需修飾的好文章。我去看他時，常見他把桌上的東西放進案頭的一個小箱子，以為他在著述，所以不便常去打擾他。他去世後，我曾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，登在傳記文學，現在不擬浪費筆墨。其他的老師不住在學校的宿舍，所以很少去拜訪了。

卅三年的暑假，中大發生一次大學潮。自卅一年始，顧孟餘任中大校長，他把學校治得很好，校譽蒸蒸日上，甚得學生的愛戴，卻不為教育部長所喜，但顧校長曾任鐵道部部長，在政界頗有威望，陳立夫對他也無可如何，只有在經費與人事方面來留難，致使顧校長憤而離職。因為他是學生愛戴的校長，數百學生集合列隊走赴歌樂山上他的寓所，遞陳情書，請求校長返校，但顧校長辭意堅決，教育部乘機先後派了兩個校長，都為學生貼大字報抗拒，所以他們也無法到校就任。學潮越鬧越厲害，先是抗拒教育部所派的校長，漸漸演成對政府的批評，一個暑假校內牆壁上都是貼滿了大字報，漸漸地隔壁重慶大學也出現了響應的大字報，假若再發展下去，恐怕要走上街道。這次學潮固然是教育部所引發，其實也是中共的職業學生所策劃，這是中共見縫插針一貫的策略，陳立夫已失去平息的能力，最後恭請委員長來兼任校長，才把學潮壓下來。委員長兼任校長，仍採軍事學校的方式，派一教育長治校，教育長是朱經農，為人穩健，校內安然無事。委員長仍常來學校巡視，或主持會議，一年後就交卸了，陳立夫得派他的荷包人物顧毓琇接任校長，這一次並未引起學生的抗拒，大概太倉

促了，職業學生還來不及策劃。我畢業所領取的臨時畢業證書，校長署名即是顧氏，但他未當過我一天的校長。

自卅年夏重慶遭受一次慘重的轟炸後，敵機未再來過，僅偶爾發放空襲警報而已。日本的敗象已露，覆亡只是時間而已。中國未來的大敵在西北，這時沈老師辭去了系主任，由張致遠老師繼任，開學後，在系主任主持下，系中成立西北問題研究學會，研究西北，以提醒國人的注意。除經常邀請專家來校講演外，還邀沈老師特別開俄國史及印度史，這兩門課是他從未開過的，又請韓儒林教授開西藏史，一位國防部的將官（是否沙學駿先生，我已不記得了）講西北軍事地理，並有畏兀兒的課程，以訓練懂回文的人，我決定以「漢武改制考」作為論文題目，來研究漢武帝開拓西域的策略，即在此時，我也學了一年的畏兀兒文，但離校後都忘光了。

中大四年，拓展了我學術的視野，也懂得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，幫助我在未來人生的旅途上，排除許多遭遇的荊棘與橫逆。我常說我是一個幸運的人，初中多讀一年，才能夠繼續升學，中大畢業論文遲寫了一個多月，才使我能夠到臺灣來，所以我常感覺冥冥中有一位主宰隨時在導引我，化險為夷，遇難呈祥。

七、誤打誤撞進中圖

卅四年七月，與我同時保送武大歷史系的葉盛玉兄畢業後要返回恩施，路過重慶，想約我同行，而我論文尚未完稿，缺這兩個學分，還不能算畢業，只有讓他先行。他回到恩施，省府派他任教育廳的科長，消息傳來，令我欣喜不已。這恐怕是陳誠主席推行計畫教育第一批回收的成果而特別優待的吧。我因此更加緊的趕寫論文，到了八月中旬，總算把這篇「漢武改制考」三萬多字的論文謄抄完畢，送呈賀昌群師審查及格，才領到臨時畢業證書。這時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全城沈浸在一片歡欣喜悅之中，但我都未參與任何的慶祝活動，畢業了我即到省府駐渝辦事處拜訪處長，商洽回恩施的事，處長說，現在日本投



降了，省府就要忙著收拾打包，你現在到恩施，恐怕找不到接頭的人，建議我不妨多待些時日，再直接到武昌去報到，可以省掉到恩施的一趟奔波。這也是實話，我只有返校等待通知。在這一段等待的時間，我無事一身輕，每天東遊西遊將沙坪壩作最後一次的巡禮，也藉這個機會探望兩位很少見面的聯中同學，一位在歌樂山上甘肅油礦局服務的袁立智，從學校到歌樂山，雖可搭公車上山，但捨不得花車費，只有步行上山。立智的辦公室不遠處，有一個高山湖泊，湖水清澈（當地人美其名曰小西湖），我們在湖中游水，或坐在岸邊飲茶聊天，一天的時間很快的打發了再返校。

袁老弟在臺灣光復後，被派到基隆，籌辦中國石油公司，卅六年 228 事件爆發時，他靠臺灣友人的掩護才躲過了這場動亂。我到臺灣時先住臺中市，他任烏日儲油庫的主管，常見面。後來他退休，移民到美國定居加州聖荷西。今年五月，他兩夫婦到臺灣來，還特地跑來我淡水小築看我話舊。在聖荷西還有一位恩高同學魯友柏兄，他是我恩高籃球隊的隊友，在中央再保公司，退休後移民去美國的。立智小我一歲，而身體仍甚健康，友柏與我同齡，但已行動不便，可見身體的好壞，並不與年齡成正比。重慶的另一位同學馮家柱，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服務，我初到重慶，因等候學校開學，在他的宿舍內住了好幾天。他不抽煙，但公司每月發一條福利煙，我去時他總轉送我，但地遠我很少去。兄弟公司生產的香菸名華福牌，是大後方最高級的香煙，比我在學校抽的勳章牌貴多了，可惜我忙，無法常去他那裡拿煙，勝利後不知他調到何方，就此失聯了。

我大學畢業的廿四位同學，畢業後各奔前程，少有聯繫。其中四位女生中的一位姓陳名璉，因她母親逝世得早，同學或叫她憐兒。她是陳布雷的么女兒，阿扁總統早年幕府中的文膽陳師孟的小姑姑，豪門之女，免不了有些高傲之氣，所以也有同學稱她璉二奶奶。憐兒也好，璉二奶奶也好，她聽了也不感覺有忤，不以為意。憐兒生得貌美，風度也好，是同學心目中的

女神，在校園中與她同散步或同消夜的都是女同學，從未見她身旁有護花使者，使得同學們對她起了遐思，只有我們少數家境清寒的流亡學生除外，我雖仰慕她，也只在課室中見面打個招呼，寒暄兩句而已。同學們爲了追她，經常跑到松林坡頂的女生宿舍，想約她散步、消夜，大都鎩羽而歸，回到宿舍中仍高聲的談論她，這情景正好像早年的台大學生談中文系的大美女林文月一樣。她思想有些左傾，畢業後跑到北京，替中共作工作，至於她是否加入共黨組織，我不知道。卅六年她被政府逮捕下獄，靠她父親保釋，帶到南京以便就近看管，但她的身分正是共黨利用的好工具，在南京依然活動如故，不久，陳布雷舉槍自殺就是爲了她的緣故。大陸變色後，她到北京定居，也結了婚，憑她的才貌，在新中國應有一番作爲與成就，但在文革中傳來消息，說她跳樓自殺了，真是令我一掬同情之淚。

到了八月底辦事處還沒有消息來，這其間我也常到系布告欄看看求才的通告，多是中學徵求文史教員，對教學我沒有興趣，也就不理會了。但新學年即將到來，柏溪的學生要搬到沙坪壩來，我需遷出宿舍，腦中盤算找個什麼地方暫時寄住。九月一日，系主任找我，說中央圖書館編纂史籍考，需要一名助理，問我的意願如何，我想此工作與我所學並不相悖，而且中央機構似乎比省級單位還風光些，且解決了覓地棲身的迫切困難，就一口答應了。四日，我拿了系主任的介紹信到兩浮支路中圖晉見蔣館長。蔣館長與系主任是留德的同學，在致遠師任系主任時，還聘請蔣館長在系開史部目錄學，不過我沒去旁聽，所以不認識蔣館長。館長看了我遞給他的介紹信後，就問我在學校唸書的情形，及看過了哪些書，我一一應答了，似乎他還滿意，就叫人事室的主任來，帶我去辦理報到的手續，並安排吃住的問題。我就是這樣毫無預感的進入中央圖書館，而且追隨蔣慰堂老長官達三、四十年，大概我與他老人家有宿世之緣吧！

史籍考編纂室在我進入之先，已有四位同事，一位尹炎武石公老先生，他是主編，西南聯



大退休教授；一位林質茂老先生，精通日文；另兩位中年男士，不知何故，對我之加入，似乎有些排拒，所以我也很少與他們打交道，對他們的名姓也未記下來。我初進館，與其他的同事不熟，甚感無聊，晚間我請林老教我日文一小時，其餘的時間則在參考室看看書來打發時間。十月，又來了一位新同事，他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的傅樂成兄，白面書生，風流倜儻，他是傅孟真先生的侄兒，父親孟博是孟真先生的弟弟，我從種種跡象來推斷，雖然他未說，應是跟我一樣，過繼在孟真先生名下的螟蛉子。傅兄年齡與我差不多，所學又相同，我們可說是一見如故，每天晚飯後一同出遊，從此我日文也停止學習，或逛書店，或上茶館，或酒店小酌，有時他又帶我到孟真先生家，參觀他的收藏。

尹老在辦公室內常常當我的面，對中大歷史系有些不實的批評，大概是從他的朋友柳翼謀教授處聽來的。在抗戰前，中國史學界分南、北兩派，北派以北大為主，南派以南京中大為主，兩派不僅對歷史的定義主張不同，對修史的方法也有異，北派重考據，南派重辭藻。柳老是南派的宗主，教課者多出於他的門下，如繆鳳林、郭廷以、柳定生等等，都是他的門弟子。自卅年沈剛伯老師接任系主任，延聘的學者不屬於南北，而是自由派，所以在系務會議中常發生爭議。十月間，賀昌群老師在重慶大公報發表了一篇「論明神宗」的文章，研究明神宗的剛愎個性與明代亡國的關係。萬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，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最久的，照說皇帝在位時間長，國家應該可以治理得更好，然而神宗死後只有二十幾年就亡國了。因為神宗的剛愎個性，被魏忠賢勾結神宗的奶娘容氏朋比為姦，利用來殘害忠良，禍國殃民。大家都知道這篇文章是在影射時政，在文教界傳誦得很廣，尹老問我知不知道作者，我告訴他是我的老師，中大教授，他才知道中大歷史系中有善於為文的諤諤之士，他才改觀。賀老師不久後被共黨外圍份子民主同盟所吸收，不知是否與這篇文章有關，導致他不來臺灣，是一件可惜的事。

八、復員到南京

日本投降後，政府規劃接收及復員的工作，十月間，蔣館長奉派為京滬特派員，辦理南京、上海一帶的文教機關及學校的接受工作，首先飛去南京，接著屈翼鵬先生也走了，我們辦公室的同仁日漸減少，最後只剩下林老與我兩人。中館將渝館館廈及普通本圖書留下，改制為國立羅斯福圖書館，凡不願復員去南京的人員，皆在羅館繼續工作。林老因家鄉已無親人，兼以年紀太大，不堪舟車勞頓，決定留下來，到南京去的只有我一人。復原到京有海、陸、空三條路線，空運一天就到了，但機位少，輪到小職員，恐怕要等很久。水路大概要十天左右，川江我曾走路一次，三峽的風光已經瀏覽過，不想再走。至於陸路，這一帶的地方，我在書上都看過，耳熟能詳，但未曾走過，再加以我自三歲離鄉，未曾回去過，我的生身父母年近古稀，也很想回去看看，故決定登記陸路。四月上旬我接到通知，配有車票一張，我即辦理復員手續，領取旅費，到時攜帶簡便行李到車站上車。我的鄰座是一位青年軍官，他是浙江義烏人，姓樓，一路有他作伴，談談說說，晚間旅店休息還可以偕同小飲兩杯，吃點四川特產醃驢肉下酒，倒也解除旅途寂寞不少。車出重慶市，經小龍坑，上歌樂山西北行，進入成都平原，公路兩邊阡陌縱橫，小橋流水，全然一幅江南景色，與川東的崇山峻嶺大不相同，古人所謂蜀道難行，當然不是指的成都平原，天府之國才是說的此處，因為土地肥沃，人民富庶，才有許多竊據以此而建國的。我們車行過內江，因為是復員專車，不經成都而從外環掠過北行。

在中國醫書上，記載有許多食物會相剋，不可共食，比如說酒不可與柿子共食，食會中毒，我們只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車行第二日，水箱漏水，越漏越多，車需經常停下加水，所以行走甚慢，至一鎮，司機下車購買柿餅一枚，高粱酒一碗，將柿餅搗爛，用酒調成稠糊，塗在漏水處，不一會即僵硬如鐵，好像電焊般，我才



知道兩者不可共食的道理。不過，我後來旅遊日本福岡時，正逢柿子上市，日本人在酒後，以柿子當水果，全然無事。日本柿是硬柿，中國柿是軟柿，日本飲的是酒精度低的清酒，而中國飲的是酒精濃的高粱或燒酒，是否因這些不同而結果異，就不得其詳，但我仍遵守古訓，仍不共食。

汽車繼續北行，漸有山陵起伏進入川北，這是成都北境的屏障，抵廣元歇息，廣元一帶漢魏的碑碣很多，鄉人拓取文字售賣，因抵達時天色已晚，看不清楚是何碑，也無法選購，只有當歸我購了一大包。此地當歸較大野生，遍山皆是，只要有時間，採收晒乾，即可入藥，所以賣得很便宜。第二天車繼續北行，經劍閣，此地兩山夾峙，易守難攻，所謂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，想見當年司馬懿攻蜀的艱辛。再繼續前行，過漢中，經棧道，第六天抵達陝西的寶雞，爲此行的終點。到寶雞轉乘隴海線火車到西安，西安到河南洛陽原有火車，但在戰時爲防日軍的進攻破壞了尚未修復，轉乘汽車接駁，此汽車爲無棚的卡車，一路行走黃沙蔽天，眼耳口鼻，堆滿黃土，每至休息站即需下車盥洗。至靈寶市，休息時，我久聞靈寶大棗之名，即購得一大包，價甚賤。到洛陽再轉乘隴海路火車到鄭州，我須再轉平漢線南下，而樓君則要到徐州轉車。當時車站人頭擁擠，我擠不進購票口，樓君此時在站休息等原車開，見狀即拿了我的錢，衝進車站去，不一會即拿了一張到信陽的快車票交我。這就是戰時軍人的好處，受到民衆的敬重，這也是交友的好處，使我趕上即將抵達的南下快車，我來不及道謝即趕赴平漢路月臺。當天傍晚抵達信陽，進城後照著我大哥給我的地址，很快找到他開的文具行。多年不見的兄弟當然有說不完的話，我帶去的當歸與紅棗，大嫂見了，還不等我說，即拿去收起來了，說這兩種是婦人最好的補品。兄弟多年不見，當然聊得很多。在大哥家住了兩晚，第三天，他帶我到車站搭車南下，中午抵達孝感，由車站到喻昌灣，約有三十華里，沒有交通工具，只靠步行。走了約兩個多小時，抵達家門，拜見了伯父、伯母，他們身體還算健朗，也見到從未

晤面的四弟，只有二哥，他做生意在外，沒有見到。我回家的消息在村裡傳開，鄉親紛紛前來探望，大概我家是么房，若干高年人也喊我「三爹」。晚間，我幾個出嫁的姐姐也回門看我，晚餐坐滿一桌，也算得一次團圓宴。鄉下的環境，在我腦中全無印象，我到處走走看看。住了三個晚上，大哥再帶我到車站，南下到漢口。出了車站，見到街道與我離開時很少改變，只是道路兩側水溝上的鐵板以及大門上的銅扣環多被日軍取走，可以想見抗戰末期，日軍已缺作戰資源。大哥送我到二姐家，他即離開，忙著採辦文具店的貨品，辦完，他即返回信陽了。我從小即跟隨二姐，我們姐弟感情最好，就是她出嫁了，我也常常到她家去玩，久別重逢，當然聊得很多。我拿出我官拜委任三級的派令給她看，她感到非常高興，我是我們家族中唯一當公務員的。我原以爲可以看到父親，二姐告訴我，他新近置了產業，又籌備製藥生意，一時無法回漢口看看。二姐帶我去看大姐與大姐夫，大姐夫是留日的，日軍佔據漢口後，逼他出來任軍職，利用他號召他父親的舊部，組軍防範國軍游擊隊，勝利了，他成了漢奸，被政府通緝，避住在舊法租界，距二姐家不太遠的一棟二樓洋房閣樓上，不見客人。我去了雖見面，但不願談往事，所以無話說，也就很快的辭出了。後來他們離開漢口，不知所往，一說他住在香港，一說逃往日本，我後來也託兩地的朋友打聽，一直沒有下文，現在應該已不在人世了。在漢口晤見了若干復員回來的中大與恩高的同學，在漢口二姐家住了五天，購江輪票東下，當晚宿江西景德鎮，下船選購點細瓷，第二天繼續航行，下午就到了南京，這次復員我走了卅多天。

九、工作變更

到達南京下關碼頭，這是我第一次來，街道不熟，僱了一部人力車到成賢街國立中央圖書館，首先晉見蔣館長，他看到我，顯得相當高興。他告訴我，館中的書增加了很多，亟需整理，史籍考編纂工作已暫停，調我到特藏組工



作，並告訴我尹石公先生也調特藏組，傅樂成調採訪組，談完後即派他的座車黃包車送我到特藏組。屈翼鵬先生當時任特藏組主任，大概他已先獲得總館的電話通知，已為我安排好宿舍及加入伙食團的手續。特藏組是戰後中圖唯一的一個獨立單位，它是接收偽組織監察院長陳群的私人藏書樓，位於南京北城的山西、頤和兩條路的交會處，建築作U字形，後面有高牆與鄰屋隔絕，中有寬廣的庭園可供大卡車迴旋，房屋原設計兩層，後加蓋一層，所以三樓不能承重，不宜作為書庫，但供住人宿舍之用，二樓為書庫及辦公室，一樓除有一大間閱覽室外，全為書庫。陳群字人鶴，福建人，早年在家鄉即收藏書，藏書之所名閣樓。二十九年年初，陳氏隨汪精衛去河內發表所謂的豔電，為日人找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，陳群任內政部長，後調監察院長。他藏書之所有上海、蘇州、南京三處，但只南京建有書庫，另兩處收藏只在家中，大抵是比較好的版本。汪精衛是孫總理的忠實信徒，怎麼會去當漢奸的，這在民間有傳說是他與委員長兩人秘密協商，委員長在後方領導軍民抗戰，他去南京減少淪陷區老百姓所遭受日軍壓榨的痛苦，居間聯絡人是戴笠雨農將軍。關於戴將軍民間的傳說更多了，說得活龍活現，說他精於易容術，能講多處的方言，在戰爭淪陷區遊走搜集情報，從未被日軍發現，當時與日本間諜川島芳子齊名。戴笠因擅於情報，為中共所深嫉，卅五年在一次飛行中，飛機為中共預先破壞，中途爆炸墜毀而殉國，聽說委員長曾為之落淚。假若戴將軍不死的話，中共席捲大陸恐怕要延遲好幾年。現在臺北外雙溪有一條雨農路，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。關於蔣汪秘密協商的傳說，是否真實，現在陽明山與大溪檔案已解禁，希望歷史家們研究出結果，昭示國人。

一個漢奸的認定，我個人的看法不在他任偽職的大小，要看他是否有殘害老百姓的記錄。陳群任官，聽說官聲還不錯，我從他藏書的情形來看，在文化上應是有貢獻的。真正的藏書家對善本很少收複本的，陳群的藏書中，複本很多，有

時重複的版本多到四、五部，從這種收藏的情形來看，具有兩種意義，一是防止善本流散，另一種應是對書香世家為了生活不得已出售善本書的一種變相周濟。日本投降後，他自知不免，在準備一切後，召喚澤存書庫的管事丁寧女士來他臥室，吩咐後事，囑咐她務必盡一切心力，保存澤存書庫中所有藏書，書版、紙張及瓷器等文物，不讓流失，丁寧女士辭出後，回頭一看他已服劇毒身亡了。丁寧女士秉承他臨終的囑咐，深鎖鐵門，僅留一小門出入，並派人搜查因事出門的人員。因陳群已死，工作人員無薪水，她拿出私蓄暫供伙食，一直熬到十月中央軍進入南京，張貼封條，她才鬆了一口氣。據她告訴我，裡面的工作人員多次想盜賣裡面的東西，甚至恐嚇威脅，一個多月總算在驚險中度過了。

丁寧女士名懷楓，揚州人，為揚州大儒陳含光的門弟子，精於詞，與我國橋樑建築專家茅以昇的女兒於美，並稱為江南兩大女詞人。家為揚州鹽商，本是富家女，但遇人不淑，所召贅的夫婿是一個鴉片煙的大老槍，敗盡家財，總算解除了婚約，為生活計，到南京找工作，進入了澤存書庫。中圖接收後，蔣館長的眼中，總覺得她是漢奸，雖留用她，只派為雇員，薪水甚少。她與我內人住同一宿舍，兩人無話不談，我與內人之結縭，是她大力促成的，在我們結婚後不久，她辭職返鄉。我對她非常感念，她曾說她已寫好一部小說體的自傳，名曰孤雛淚，她說你們假若看到了這部書出版，就表示我已不在人間。我來臺灣，常託大陸朋友打聽這本書有否出版，但無消息，我也想寫點紀念她的文字，但總感覺搜集的資料不夠，遲遲沒有動筆，後來工作一忙，就把這事給遺忘了。現在想來，感到慚愧。

我沒有學過版本目錄，整理古籍編目的工作，不能得心應手，工作得頗為苦惱，因萌辭職的念頭。六月，賀老師接任歷史系主任，復員到南京，我到學校去看他，說明來意，原希望返母校任助教，他不等我說完，就連呼不可。他說中央圖書館，就是古代的秘書監，藏書多而且罕見，多少人想去看書還不容易，你有這麼好的機



會，怎可輕言離去，不懂版本目錄可以學。接著他教我方法，每編一部書，先看它的序和目，了解這書的源起和大概的內容，然後查四庫總目提要，看它有無著錄，若無著錄，表示此書罕見；有著錄的，可以看提要對此書的批評。未著錄的，再查各家藏書志，了解它傳世的版本異同，若各家書志書目都未著錄，那就表示此書是孤本秘笈，要特別珍視了。你一天編一部，等於看了一部書，編十部則看了十部書，還是何等好的工作，怎可輕言放棄。我聽了賀老師的訓示後，辭出返回辦公室，於辦公桌邊置一書架，再到書庫中調取目錄書，澤存書庫中有關目錄的書很多，我各調取一部放置在書架上，供隨時取閱，工作起來，果然不像以前那樣感到枯澀。在組中有兩位老先生可以說是我啓蒙的老師，一位尹老石公，他長於目錄，對於歷代圖書分類沿革如數家珍，也就是因為這才能為館長聘為史籍考的主編。另一位是我同辦公室的葉仲經老先生，他曾在南京夫子廟的舊書舖工作多年，對於書林的掌故，非常熟悉，對於歷代藏書家的收藏印章，多能鑒別真偽，他也是版本鑒定的高手、作偽的專家，曾替他的老板偽造過許多假宋元版。我編目時，遇有不懂時，常去請教他們兩位。經過了幾個月的訓練，漸漸入門，對於版本的鑒定，開始有了意見，把證據寫在編目草簽的備註欄中，送請屈主任卓裁，也因此獲得屈公的青睞，我被派為第一批善本運臺的押運員，這是主要的原因。我對清末以來各大家藏書志的分類與藏書重點了解後，查起來快捷得多，譬如明末清初人的著作，都是他們比較少著錄的，我就直接查民初傅以禮的華延年室題跋，省事不少。幾個月下來，我也儼然成為專家，不過這時對於疑似宋元版的書還不敢碰，對於佛教典籍，我不懂佛學也不敢編，都送請他們兩老去編。我所編目的多是明代刻本，到後來，只要見到其書的版式與字體，就可以大致推斷它出版的時代。兩年多下來，經過我考編的善本書，大概有一千多部，約為中館收藏的四分之一。

在南京時期，我比較喜歡看宋元以來的筆記

小說，我研究元末大儒陶宗儀編的《說郛考》，即開始於此時。藏書中有很多明代藩王刻的書，我因好奇，遇到了隨時割記，為來台後首先發表《明藩刻書考》的張本。卅六年秋，採訪組收購到一部元代用朱墨兩色印行的金剛經，消息發表後，引起了學界的注意，但朱墨套印技術，自來認定是明萬曆末年吳興人閔齊伋所發明的，北方的版本學家心存懷疑，紛紛來南京欣賞。經袁同禮、王重民等專家仔細審定，確認是元刻無疑，不是膺本，只是在文獻上還找不到依據。當時我正在看明胡應麟所著的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在《筆叢·經籍會通》中發現了一段話，他說：「凡印有朱者，有墨者，有靛者，有單印者，有雙印者，朱與雙印必貴重用之。」胡應麟是浙江金華人，萬曆四年舉人，十七年著成《經籍會通》，這時閔齊伋還只是一個小孩子，可以證明他所見到的雙印本書絕不是閔氏的刻本。有了這個發現，我研究胡氏、閔氏的生平，寫了一篇小文章，送請屈公審閱，他大為欣賞，送中央日報副刊發表，獲得版本學家的認同。因為有了文獻上的佐證，把我國朱墨印刷術的歷史向上推了二百多年。工作了一年多，藏書編目已將一半，為了使這些書能供讀者借閱，計劃先以油印成目錄供人查索。為討論這新目錄，屈主任召集一個會議討論它的類例。我國自唐志以來，對於史書依體裁區類，有正史、別史、編年，入宋又增紀事本末類。所謂正史指史記、漢書等紀傳體史書，得史體之正。別史者，前已有著作，後來又有撰著者，如唐志把李延壽的南北史列在別史，因前已有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北魏、北齊、北周等書，此為別出者，謂之別史。但明國子監刊刻諸史如十七史、廿一史，將李延壽的南北史與史漢並列，清四庫因襲增為廿四史，所謂正別史的意義又為改變，即是經政府明令頒布者為正史，其餘的列在別史。現在已非專制帝國時代，意義應該有所改變，我在會中建議將來正、別史合為紀傳類，與編年、紀事本末都是依史著的體裁來分類，獲得屈主任與同仁的一致贊同，在臺出版的中館善本與普通本書目都依此類例，也獲得他館的沿用。



在南京時代，我要感謝一位先生，他就是孔德成達生奉祀官，卅六年春我結婚，臨時租得一棟新蓋成的樓房之樓上一間，房主因籌備開店尚未完成而空著，但只允出租三個月，我即將此房作為新房。三個月轉瞬即過，需另覓屋。這時南京人口增加甚速，房屋奇昂，在辦公處所不遠處找到一處兩進舊屋，其左廂有兩房出租，月租雖不甚貴，但需要一筆高額の押金，就不是我們這對工作未久的青年夫婦所能負擔的，虧得屈主任介紹認識孔奉祀官，他說從曲阜運出的幾十箱文物剛需找房子存放，於是就由奉祀官付押金，我只付月租即可，解決了我迫切的問題。我們與這批鐘鼎彝器隔板壁而居一年多，大概沾染了寶物靈氣，我的兒子就是此房內出生的。卅七年秋，我辦公室又有一位同事要租屋，也是屈公與奉祀官接洽，把這些文物箱件搬走讓給同事租，我才知道孔奉祀官並不是他的文物箱沒地方放，而是

不露痕跡的幫助我。這份恩情我一直記在心裡，來台後，孔公一直在臺大教授儀禮學，也會做過一任考試院長，他又是故宮的指導委員，每年都有機會與他同桌共飲。他長我一歲，我退休後即未再與他見面，但感念之心長存，謹藉此篇幅敬祝他身體健康，福壽綿長。

卅六年，政府實施間接民主制度，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，委員長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，李宗仁當選副總統。而中共軍獲得蘇聯的協助，接受了東北日軍遺留下的軍火，勢力強大，席捲了華北，北京城成為孤島。南方的經濟破產，通貨膨脹，關金券狂貶，政府邀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任財政部長，改革幣制，發行金圓券，禁止銀圓流通，平抑物價，但什麼東西都買不到，甚至香菸、奶粉，只有偷偷的向黑市購買，我們兩夫婦一年多來辛勤攢的一百多塊銀圓，都被王雲五給騙去了，現在想來猶感辛酸，不談也罷。



【特
載】